

祠堂与祖厝：“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

焦长权 周飞舟 王绍琛 庄家炽

摘要: 文章通过对文化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分析了“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认为其源头可追溯至“仁”“义”为基本德性的儒家伦理,在历史基础上形成了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的行动原则,在现实层面上则表现为以祠堂、祖厝为载体的尊祖敬宗活动,这些活动背后蕴育着以合作、诚信、仁爱为中心的精神理念,并对晋江的经济成功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 晋江精神; 宗族祠堂; 历史建筑;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15)02 - 0021 - 07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两个主流的理论解释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假说。两种理论均捕捉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关键特征,但二者的一个共同缺陷是难以较好地解释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域性差异。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则很早便触及到了不同的地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但是对不同模式的解释则比较粗略,没有来得及深入挖掘不同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本文承续社会学家的这些研究,以“晋江模式”为案例,从地域性社会结构和民风民情的角度,对文化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可能关系做一探索性说明。

一、问题与路径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最早开始从文化的路径关注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的产生与转型,进而作出了经典的判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①所以,韦伯非常重视对社会行动的动机和理念的考察。在中国研究领域,也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率先开始从文化与制度互融互涵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理性化的社会变革。^②1980年代,金耀基、余英时等学者率先发起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这一理论命题直接源自韦伯,或者说是一种韦伯问题的“反命题”。韦伯认为,儒家伦理对于中国的理性化进程具有极强的束缚作用,使她无法内生地发育出理性资本

作者简介: 焦长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绍琛、庄家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义;而80年代这批学者的讨论大多都从相反的角度来思考韦伯的命题,即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之间的可能内在机制。^③从方法上看,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从儒家经典典籍出发,从不同角度阐释儒家伦理的特质,并与西方近代新教伦理对比,以寻求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之间的可能关系。他们对儒家伦理的解读,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思想史”方法,是一种“集锦式”的分析策略。^④但是,通过儒家经典所阐释的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毕竟还有一段很长的论证空隙。如何将这种“思想史”式的探索进一步“落地”,即如何进一步将“思想史”的探索与“社会史”^⑤甚至田野调查的方法相结合,是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的关键。一些学者对中国宗族社会的深入研究,为这种结合提供了尝试的可能。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将中国、印度、美国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了“宗族、种姓与俱乐部”(3C理论)的理论,认为这三种要素基本代表了三个国家的文化基因与内核。按照许先生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印度是一个种姓社会,而美国则是一种俱乐部社会。^⑥弗里德曼等对于华南地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⑦郑振满等历史学家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宗族社会的研究加入了历史的维度。^⑧宗族社会作为儒家宗法制度民间化实践的历史结果和现实载体,为更加具体和地域性地讨论社会结构、文化理念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本文试图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关系中,把典籍中的伦理理念和生活世界中的伦理实践结合起来阐述人们经济行为中可能存在的文化伦理动因。美国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已经从这个路径对东亚经济奇迹做出过有益的探索,他认为促进东亚工业发展的并不是儒家的理论,或士大夫的儒家思想,而是儒家思想渗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一套道德规范,他称之为“俗世化的儒家伦理”。^⑨显然,他过于强调作为“大传统”的儒家伦理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之间的区别,忽略了二者本质上的统一性。下文将对“晋江模式”与“晋江精神”之间的可能关系,以及“晋江精神”的深层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做一探索。当然,从文化角度来思考晋江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决定论”思维。晋江模式的出现,其因素错综复杂,从国际市场格局到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中央宏观政策到地方治理实践,从本土企业家到外来农民工,缺少哪一方面的因素,都形塑不出晋江模式的现状。从文化角度来解读晋江模式,只是试图揭示晋江模式的一个侧面,这或许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深层侧面。

二、“晋江模式”与“晋江精神”

晋江模式有两大关键特点:产业集群和品牌建设。晋江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鞋服产业,年产值已经近1000亿元,拥有各类鞋服企业数千家,年生产运动鞋量占全国60%,约占全球20%的市场份额。全市围绕鞋服产业形成了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各企业之间也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良性互动。同一产业、产品在如此狭小的地域范围内的大规模集群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这种产业集群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自我调节和发育的结果,全市企业主体中99%是民营企业,即使是1990年代初全国乡镇企业如日中天的时代,晋江依然以民营企业为主(或者是许多“戴帽”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居然形成了一个如此巨大的产业集群,不得不说,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他们之中90%以上又是本地资本和企业家,是一种典型的地域内生型的民营企业集群。毫无疑问,竞争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特征,尤其是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更是以惨烈著称。但是,为何晋江鞋服企业之间在竞争中能够达成一定的合作,共同推动了产业的做大做强,而没有陷入恶性竞争导致产业萎缩?这可能应该从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理念方面去找原因,即需要从企业家之间的社会关系、企业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家的行动理念方面去寻找答案。与之类似,晋江的品

牌建设也与此密切相关。晋江称为中国的“品牌之都”是完全当之无愧的。以鞋服产业为例,我们朗朗上口的各种品牌绝大部分都是晋江产品,利郎、七匹狼等品牌服饰是中国本土制造的骄傲,而运动鞋的品牌产品,除李宁之外,基本都是晋江制造。所以,晋江人笑称,CCTV5就是“晋江频道”,因为上面的广告大都是晋江产品。品牌作为现代企业最重要的隐形资产,是企业寻求信誉和追求卓越的关键途径,是企业通过社会声望的途径来获得大众认可的内在方式。虽然寻求品牌效应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家的共识,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早期阶段,到底是哪些企业家最早拥有品牌意识却不是一个普遍的法则,而是与地域的文化理念和企业家精神相关联。正如韦伯所言,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它在全世界的扩展并不一定需要新教伦理保驾护航,但是,在其原初的发育阶段,新教伦理却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晋江的品牌建设,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早期阶段的故事,晋江之所以形成品牌之都,正是因为他们较全国其他地区都较早的、内生性的开始注意产品品牌的作用,这也许就与当地的文化精神密不可分。

既有的对晋江模式的研究,无论是学界还是地方官员的总结,都已经提出了“晋江精神”的问题,认为一些精神气质方面的因素对晋江模式的出现非常重要。当地政府将“晋江精神”概括为“诚信、谦恭、团结、拼搏”。应该来说,这大致抓住了晋江精神的主要特点。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域社会,这种概括也都有某种或远或近的契合性。那么,晋江人的“诚信、谦恭、团结、拼搏”与其他地域人的类似概括相比,在生活实践中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不同,又因何有这些特点?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何在?我们认为,“晋江精神”根源于闽南地区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理念,是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孕育出来的一种“经济伦理”,是晋江奇迹的精神“发动机”。

闽南地区是我国宗族社会发育最成熟的地区之一。宋明之际,伟大理学家朱熹长期居住和讲学于闽南地域,对闽南的宗族发育和地方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张载、朱熹等学者的努力,我国历史上只在贵族或上层社会中实践的宗法制度得以民间化,民间社会通过修筑祠堂、编修族谱等方式得以重新组织化,明清之际达到了顶峰。地方宗族基本垄断了社区事务的治理,将皇权隔离在乡土社会之外,形成了皇权与绅权之间不断平衡和互动的“双轨政治”。^⑩但是,由于自然生态、开发早晚、离皇权的远近以及战乱破坏等原因,宗族社会在中国的发育状况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总体而言,华南地区(闽南、潮汕最为突出)由于距离皇权遥远、地方社会相对稳定、水稻种植所需的灌溉合作以及朱子等大思想家的“春风化雨”等多种因素的混合作用,宗族社会发育非常成熟,形成了祠堂、族谱、族规、族学、族田等一系列的宗族社会要素,这些社会制度担负了传统社会中的大部分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职能,并使基层社会内聚团结,民风坚毅淳厚。华北中原地区则由于战乱破坏、生态相对不稳定(黄河患难、干旱饥荒、蝗虫肆虐)等原因,宗族社会发育成熟度较华南偏弱,形成了部分宗族社会的样貌。而江汉平原、东北地区则属于明清之后的移民社会,开发时期较晚,加之清末以来的社会动荡,宗族社会的发育刚刚开始即被各种社会运动所阻滞,所以宗族社会形态最弱。有学者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将上述三种典型地域分别概括为“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⑪这是比较恰当的一种理论总结。

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自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到文化革命时期的“破四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打碎传统宗族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国家权力期望直接进入乡村的各个角落,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总体性改造。但是,由于不同地域宗族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导致他们对来自国家权力的各种革命运动的差异性反应。华南地区宗族社会发育成熟,所以即使面对国家权力的强烈改造,村庄社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破坏和重

塑结果形成了一种被一些海外学者所称的“蜂窝状”社会结构^⑫，各个村庄内部仍然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团结性，以共同抵御外来影响。华北平原由于村庄内部同时具有几个有行动力的小家族而容易形成各种派性斗争，这在各种土改研究和地方史研究中都得到了反映。江汉平原和东北平原等地区则由于本身宗族力量很薄弱，很快被国家革命运动所瓦解，社会快速原子化，国家权力也得以最顺利地进入村庄。1980年代国家权力逐步退出村庄之后，不同地区的宗族复兴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华南地区很快重新建立起了完备的宗族组织，并实质性地恢复了大部分宗族活动；华北地区次之，部分恢复了宗族社会的传统；而江汉平原和东北平原的乡村社会则完全没有了宗族社会的影子，也无人再去关心相关事务，社会结构比较彻底的原子化了。

不同地域差异性的社会结构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结构力量，也同时包含着一套与之配合的规约人类行动的准则和理念。以传统宗族社会为例，宗族社会对成员的行动规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族规之中，宗族成员违反族规往往会遭致相应惩罚。所以，经过从小开始所受的家族长老和宗族氛围的耳濡目染，宗族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已经将宗族社会的行动规则和理念化身成了自己“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这即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从俗即从心”的过程^⑬。与宗族社会中的成员相比，华北分裂型派性社会则容易形塑人行动过程中的派性意识，所以个体往往表现出对他人的防范性心理和自我保护意识。而原子化地区的社会则表现出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个人”的凸显^⑭，个体主义行动原则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公共性的事务缺乏人关心。当然，这些都只是对一种地域社会中的普遍性行动原则的一般说法，人类行动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外在形态则是多种多样。但是，某些行动原则在一种地域社会结构中具有正当性的地位，而在其他社会中这种原则的正当性就不是那么的强烈，甚至于没有约束力。

三、“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

那么，在典型的宗族社会中，引导人类行动的最核心理念是什么呢？或者说，哪些行动原则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具有最强的正当性，并因之演化出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其他延伸性的行动准则？

从传统儒家的经典文献来看，“亲亲”“尊尊”与儒家伦理中最根本的社会行动原则，本乎于人情，表征于礼教。《孟子》“离娄”篇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朱子《四书集注》曰“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亲”和“尊尊”是“仁”“义”伦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具体展现出来的“事亲”与“敬长”行为，由此种最本乎人性的具体行为向外拓展，构成了社会中的基本伦理准则。周孔教化下的民间社会，尤其是宋明之后宗法制度民间化实践后所重新组织起来的宗族社会，以“亲亲”和“尊尊”为表征的“仁义”之道就成了人们行动的最高正当性原则。闽南地区是我国传统宗族社会发育最成熟的地区之一，反映在晋江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亲亲”与“尊尊”之道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首先，宗族社会的成员特别重视尊祖敬宗，这是“尊尊”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用我们访问的安海镇前蔡村老支书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没有祖宗的观念。我们之前说的家风，有一些都是这些家族传承下来的。比如我奶奶当时就教育我们，有恩必报，有仇不报，要感恩。没有祖宗和宗祠，从道德规范这块讲，就没有约束了，它就像国外的教堂一样……这个用现代的话说是优良传统，家风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祠堂文化最重要的是育德。”

尊祖敬宗 故慎终追远 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厚葬(慎终)。有种说法叫“死在晋江”,主要就是描绘晋江人厚葬的传统,人们将葬礼作为人告别世界的最后仪式来隆重操办,甚至达到让人难以想象的“奢华”程度。以至于前几年政府不断提倡葬礼简办,将节约出来的经费捐做慈善事业,结果,人们办完丧事捐赠善款又成了新的社会习俗。当然,企业家的这种慈善并非是西方慈善理念的体现,而是认为捐款行善可以福佑子孙。这种由尊祖敬宗发展出来的慈善行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既符合人情事理,又契合现代公共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公共道德行为。而这种行为恰恰是与人们重死厚葬的传统联系在一起。二是重祭(追远)。重祭是慎终追远的进一步表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和祖厝体系的高度发达。祠堂俗称“家庙”,是宗族供奉祖先牌位、开展集体祭祀和开展宗族其他公共活动的场所。祠堂是宗族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和外在表征,是维系宗族团结非常重要的物质性要件。祖厝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供奉祖先的公共建筑,厝有居住地之意,所以闽南常有王厝、林厝等村庄名称。因此,很容易理解,祖厝即祖宗安居之地,其功能与祠堂相似,只是规模一般较祠堂为小,主要供奉五服以内祖先的牌位,若是五服以上,则将之集体移到宗族祠堂之中。或者说,祖厝内供奉的是一个房头(支)的祖先,而祠堂里面供奉的是整个宗族的祖先。若以古代宗法制度类比,则祖厝内供奉的是各小宗的祖先,而祠堂内供奉的是大宗的祖先。祠堂和祖厝,作为祖先的安息之所,将宗族的历史以物质化的载体保留下来,因此也将宗族成员当下的生活与悠远的历史联系起来,让人们将此世的生活与彼世的荣耀关联起来,给平凡的生活增添了历史感和神圣感。二者既是宗族社会的主要外在象征,也是维系宗族团结极为重要的工具性手段。三是强有力的老人协会。在闽南地区,老人地位非常之高,各个村庄都有组织力很强的老人协会(“老人会”)。这些“老人会”是老人的自我组织,一般以村庄内的公共庙宇为日常活动场所,有些老人会也有自己独立的活动场所。一般而言,老人会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区内成功人士的捐助和老人会的自筹收入(比如负责社区公共场所车辆的看护所获报酬等)。有些村庄老人会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比如梅岭街道竹树下社区的老人会,它有一栋独立的五层活动大楼,其中第一层店铺和部分楼层出租,收入归老人会拥有,加之社区人士捐助和自身其他创收,老人会居然拥有300多万元的存款。据安海镇前蔡村老书记介绍,有些老人会的力量甚至能够达到干预村庄政治的地步,村两委若是做出了明显的不利于村庄的决策或者村两委行动力过弱,都可能出现老人会干预村庄政治的情形。这足见当地老人地位之高。与江汉平原这种老人高比例自杀的原子化地区相比,^⑤仿佛这不可能发生在同一个国度。

其次,亲缘团结是整个社会得以形成的根本力量,这是“亲亲”理念日常实践的结果。在典型的宗族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是不会被凸显出来的,家庭是社会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单位,同时,超越家庭之上、在血缘和地缘上基本重合的宗族组织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单位。就公与私的范畴来讲,家庭与宗族相比,家庭事务一般属于“私”的范畴,而宗族事务则属于“公”的范畴。诸多公共事务和公共原则都是以宗族为单位来制定和实践,由于血缘和地缘的高度重合,宗族性的行动理念也成为村庄社区中所有人的公共行动规则。以亲缘为基础的社会团结是先赋性的,是个体无法选择的,是一种“身体无意识”的本能性的团结感。因此,宗族团结具有自身作为目的的倾向,在行动者所面对的各种社会事件中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宗族作为一个行动单位,既出现在民间社会的公共祭祀活动中,也出现于面对国家的政治治理活动中,即使在各种经济实践活动中,它依然能够作为一个行动单位出现。在晋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宗族团结在里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晋江早期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企业,都借助于家族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即使到了今天,那些发展最成熟的品牌和企业也有诸

多宗族社会的影子。如林氏家族的“九牧王”集团,就以林氏“九牧传芳”的家训为品牌来源;王氏三兄弟创立的“利郎”男装,“七匹狼”则源自以周氏三兄弟为基础共七人合作创办的服装企业;等等。宗族团结还是企业民间融资的主要中介,保证了企业资金链的正常运转。晋江地处闽南,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由于宗族关系的联结,晋江地区的侨汇较多,很多晋江的企业家就是靠着海外亲属的侨汇很早就创办了企业。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资金链是其要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晋江的许多企业正是凭借宗族成员内部的互相周旋,一次次渡过了难关。安海镇前蔡村的发展历程最鲜活地展现了这个过程。前蔡村是一个只有1000多人口的小村,村中绝大部分人属于蔡氏家族,全村一个宗祠,三处祖厝。自1980年代起,村民办起了十几个食品加工企业,这些企业全都是家庭企业,生产相同或类似的产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村已拥有26家大型的食品加工企业,最著名的是盼盼集团。在家族和宗族力量的协调下,这些企业互相竞争与合作,合力开拓市场,形成了现在的繁荣局面。

最后,宗族社会的成员有较强的社区声望追求。他需要在宗族社区中获得人格实现,所以非常重视社会舆论的力量和约束,这是“亲亲”和“尊尊”原则在社区性层面的表达。而反映在实践中,行动者往往有很强的安土重迁情结,对社区公共事务具有较强的热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很容易表现出来,企业和地域社会(村庄社区)之间也容易形成良性互动。在闽南宗族村庄中,宗族与社区在地域上具有很高的重合性,宗族成员在宗族中追求声望和人格实现的行动,实际上也是在社区中追求声望和人格实现。这使宗族个体主动将自身的生命融入到宗族(社区)中去获得意义和价值,让他们以宗族历史上的祖宗先贤为行动的标杆,最终达到光宗耀祖的结果。比如,由于晋江90%以上的企业家都是本土企业家,很多又是家族企业,他们深深嵌入在本地的宗族和社区之中,对本地社区的发展都具有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责任。结果,这些企业家都主动参与到本地各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建设上来。举其大者,晋江机场的建设就是一例,晋江离厦门仅一个小时车程,按照经济理性计算,晋江机场的建设完全没有合理性。但是,正是由于晋江企业家的本地认同和责任意识,他们捐款建设了晋江机场。这在村庄社区层次表现得更加明显。晋江每个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都有本社区企业家参与,他们捐款修建学校、道路、公共庙宇等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江各中小学都有校董事会,诸校董就是社区中捐款助校的企业家。这些都是企业与当地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社区的健康发展也促进和保障了企业的持续发展。以教育为例,晋江市是全国最早让农民工子弟在当地免费就学的地区,目前,全市中小学中有60%的孩子是外地农民工子弟,总数量近30万人。近年来,晋江在免去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之后,又免除了学生高中阶段的学杂费,这样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外来农民工子女,而这些在全国都是最早的。晋江之所以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大量的企业社会资金通过捐助的形式进入到各层次的办学之中。正因如此,晋江才留住了100多万外来劳工,成为全省最大、全国著名的外来劳工输入地,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用工支持,保障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尊祖敬宗、亲缘团结和宗族(社区)声望,这些是典型的宗族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人的行动理念。他们的共同作用和长久沉淀,塑造了晋江的民风民情,滋养了晋江人的“心灵习性”。

四、结论与讨论

总体来看,“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可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作为其物质载体的祠堂与祖厝体系;二是作为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宗族结构及宗族社区;三是作为其内核的“尊尊”与“亲亲”的行动理念。这种具有层次性的立体结构才是晋江民风民情的社会基础,各个层次之间

是互相维护的,它们是不能分别独立存在的三个方面。祠堂与祖厝等外在物质性存在,不仅是晋江文化风貌的客观载体,更是“喂育”人们的行动理念和道德规范的重要场所,形象的说,它们是“晋江精神”的文化“容器”。晋江人在经济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晋江精神”,正是上述因素在面对经济实践时的某种外显形态。因此,“晋江精神”是“晋江模式”的文化伦理动因,是晋江人经济行动背后的理念“图像”。

然而,在晋江由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作为地域性文化精神的“容器”,祠堂和祖厝遇到了转型的困境。以晋江来说,城市化意味着城市空间不断外延,绝大多数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1980年代以前,晋江虽然历史文化悠久和商业文化盛行,但城市化基本没有起步,全市只有安海、陈埭、青阳等几个小集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非常低。而且,当时城镇的建设布局和农村相差不大,实质上是集中居住的农村。比如,以当时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安海镇为例,安海镇为千年古镇,但镇上人口规模并不大,集镇建筑安排则和村庄无异,其中夹杂着数量众多的祠堂、祖厝、村庙等建筑。直到现在,安海镇老区依旧是祠堂与祖厝林立,成为城区改造的一个难题。安海的难题也是晋江目前的难题。晋江已由过去几个几千人口的小镇,快速扩张成为现在几个数十万人口的城市,它需要大规模的老区改造和村庄征地拆迁,而这都直接面临着如何保护祠堂和祖厝等文化建筑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数量众多的文化建筑拆迁改造过程中需要的巨大经济投入,也对城市社区规划和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若是在城市集中小区中安置着祠堂和祖厝等宗族建筑,则宗族的祭祀、丧事等集体活动也会自然地迁移到小区之中,而这些活动所造成的空气污染、环境噪音等问题确实都不好妥善解决。所以,一些地方在实践中采取了能拆就拆的策略,但这样不仅激化了拆迁改造中的干群矛盾,更重要的是把地域性的文化“容器”扫荡一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何使城市化的过程能够承继传统的文化载体,以承续祖宗先贤殚精竭虑所积淀的精神气质,这既是对晋江的挑战,更是对中国的挑战。

注释:

- ①[德] 马克思·韦伯《宗教与世界》,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7页。
- ②[德] 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页。
- ③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载《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④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 ⑤仔细来看,余英时先生有关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讨论,确属“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但他所探讨的却是明清之际我国的商业发展和商人精神问题。其他直接论述儒家伦理与现代东亚起飞之间关系的论著,则相对较为缺乏扎实的经验研究(社会史)的维度。
- ⑥许烺光《宗族、种姓与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 ⑦[英]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 ⑧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 ⑨转引自陈来《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中国青年论坛》1989年第2期。
- ⑩费孝通《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4页。
- ⑪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 ⑫Shue Vivienne,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⑬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 ⑭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4页。
- ⑮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Ancestral Temple and Ancestral House:
Social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Jinjiang Spirit"**

Jiao Changquan/Zhou Feizhou/Wang Shaochen/Zhuang Jiachi

The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f social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Jinjiang Spirit"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ethic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 the source of the "Jinjiang Spir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basic moral norms such a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 which have become the principle of action with "harmony" and "respect" as the core in history and are manifested in ancestral worship activities with ancestral temple or ancestral house as the carrier in realistic aspect. Behind these activities a spiritual idea is cultivated centering on cooperation , good faith and kindheartedness , which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Jinjiang's economic success.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Yan Fu

Xue Jing/Wang Zhenglu

Yan Fu is an enlightenment thinker in modern China. His new learning epitomized the thought of this new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since his death , there have been roughly three types of research on Yan Fu among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set their choice on different stages of Yan Fu's thought that was radical (or advanced) at earlier stage and conservative (or backward) at later stage or focused on the consistency of Yan's thought , it reflected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and mindsets formed in the diffe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 ideologie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and also embodied the stipul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ntents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the researchers paid attention to. Frankly speaking , each of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e three types of research has its own rationality with outstanding results. However , in terms of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 we can expect that the above - mentioned three types of research or research in different stages on Yan Fu will certainly be integrated at a higher level or will be synthesized based on a new analytical foundation. Only by doing so can our understanding of Yan Fu be much closer to the historical reality.